

探析扫黑除恶电视剧的叙事创新表达

——以《狂飙》为例

王雪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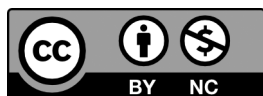
摘要 |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以此为题材的优秀电视剧不断涌现，不仅起到积极宣传与弘扬党和国家政策的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的成功离不开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本文将以电视剧《狂飙》为例，探析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创新表达。一方面，在构建京海市等一系列虚拟叙事空间的过程中，以《狂飙》为代表的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提取、改编了真实案件的内核及涉案人员的典型特征，让电视剧在多个方面既植根于社会现实，又具有卓然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在特殊的叙事视角之下，此类电视剧节奏张弛有度，以丰富的想象力充盈着叙事的角角落落，在“冷峻”与“温暖”中架起了一座现实主义的桥梁，并于多线表达中使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互成就。

关键词 | 扫黑除恶；电视剧；叙事创新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影视艺术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形式之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正如马克思文艺理论所述，“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反映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是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内涵”^[1]。自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并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以扫黑除恶为题材的优秀电视剧不断

涌现，如《狂飙》《人民的名义》《罚罪》《巡回检查组》《冰与火》《三叉戟》《扫黑风暴》《破冰行动》《反黑》《对决》等，深受观众喜爱。优秀影视作品频出，不仅起到积极宣传与弘扬党和国家政策的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

[1] 畅广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40页。

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中,电视剧《狂飙》打响了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在2023年的第一枪,热度及好评一路狂飙,曾17天稳居黄金时段全频道直播关注度第一,暂居近九年央八剧集收视率第一。在酷云互动首期发布的2023年1月全端播放量榜单中,《狂飙》以25.08亿的全端播放量遥居榜首^[1]。《狂飙》等题材电视剧的成功,离不开专业的演绎、影像审美及主旋律精神引领,更离不开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本文将以电视剧《狂飙》为例,探析最新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创新表达。

一、改编创新:题材亮点与现实提炼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党与政府不断致力于“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2],为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真案例。在叙事创作时,此类电视剧便有着更为突出的题材亮点。一方面,其剧情常改编自真实事件,其中不乏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话题性原型人物,极具现实主义色彩,易获得公众关注。如《扫黑风暴》的故事背后就有着云南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等四项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巡回检查组》中更是有许多台词源于政法系统的真实文件,它们一经播出便引发观众热烈的讨论。另一方面,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具有非常丰富的题材发挥空间,融犯罪、悬疑、动作、刑侦、爱情等元素为一体,展现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等社会痛点,情节更加多面复杂,在吸引不同观众群体的基础上,讨论更为广泛的社会议题。

《狂飙》的叙事创作既浓缩了无数原型事件,与真实案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符合剧中的人物转变及时代特色,赋予了本剧一份独属的叙事魅力。在改编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创作团

队不断将其进行提炼、整合、创新突破,这才造就了《狂飙》的叙事包含着高浓度的生活贴近性、案件冲突性和情节丰富性。剧中黑恶势力的头目高启强原型就并非单个人物,而是取自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攻破的多个案件。高启强与弟弟高启盛创建以高氏家族为基础的强盛集团,猖狂到扬言“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原型就来源于辽宁大连徐长元涉黑案。徐长元曾任辽宁省庄河市委副书记等多项公职,以官养商、以黑护商,涉黑的家族企业和势力涉及范围极广,并频频使用暴力手段敛聚黑财。同时,其不幸的童年遭遇及过早承担家庭重担的长子身份也与高启强重合。剧中的高启强为了让自己的黑恶行为更加隐避,从商界跨步至政界,不仅做上了政协委员,还通过建设幼儿园和养老院等慈善行为粉饰自己,表面上是宅心仁厚的政界标杆,实际上却是居心叵测地在基层公务人员及退休老干部中发展、巩固人脉,背地里继续做着放高利贷等猖狂的行为。电视剧更是通过高启强的左膀右臂唐小龙、唐小虎展现了非法敛财及暴力催债的具体过程。如曾连续三年被区评为优秀个人石磊为了周转种业公司,在银行蔡经理的诓骗之下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不仅跳进了利滚利的无底洞,还被唐小龙以逼着献血的方式同意变卖祖屋,他的父母即使在老家也躲不过无尽的骚扰。在公安及高层领导的巨大“保护伞”之下,石磊的遭遇真实展现了一个好人是如何被黑恶势力无处不在的爪牙捕获、压榨、逼上绝路,为无数面

[1] 酷云互动:《酷云互动全端播放量月榜发布,〈狂飙〉强势夺冠!》, <https://view.inews.qq.com/a/20230201A06LYZ00>, 访问日期:2023年2月1日。

[2]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24/content_5260130.htm, 访问日期:2018年1月24日。

临“黑暗”时痛苦而无助的原型受害群体发声。再如剧中京海市电力局副局长杨健被高启强腐蚀后做出的种种罪行，便是改编于黑龙江“李氏兄弟”涉黑案。李氏三兄弟以“电霸”的身份在当地恶贯满盈，仗着大哥李伟作为电业局副局长，通过非法手段垄断了当地电力系统大量份额。电视剧中杨健仗着与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利益输送关系，指使手下马涛的电力公司垄断市场，以极高的收费提供质量低下的工程，可谓在“用电界”一手遮天，甚至大胆到以停电威胁家里需要用冰箱保存胰岛素的服务员，让其在招待所的盒饭中塞强盛集团的名片威慑指导组。除此之外，高启强的原型还来自广东茂名曾仕权涉黑案等多项真实案例，可见创作团队的前期工作做得十分充分。

不仅如此，《狂飙》主人公安欣的角色也来源于非虚构创作，电视剧巧用“加法”，铸造了安欣难以磨灭的特殊形象，在现实改编中传递出积极的价值观引导。当我们看见在手榴弹爆炸的前一瞬推开同事、自己扑上前去的安欣时；看见被钢筋戳穿了手臂，却坚持不放开犯罪嫌疑人的安欣时；看见满头白发，却依旧奋战在扫黑除恶一线的安欣时，其实我们看见的是现实生活中无数英雄的缩影，他们是不到四十岁便熬出满头白发的缉毒民警雷鸣、身负十余处砍伤却与歹徒搏斗到底的民警应健达、排爆现场舍身救下同事的中队长张保国……正是“安欣们”的英勇奉献，才有了今天长治久安、清风正气的社会。罗曼·罗兰曾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虽然安欣只是一民普通的刑警，却是无数平凡英雄的真实写照，他用自身的蜕变为我们重现了现实榜样。

在改编真实案件的过程中，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团队有效地提取出了各现实案例中具有戏剧性、争议性的情节与思想，并将它们巧妙

改编。其中，“亲亲相隐”的现象就是各涉黑案件中的一大共同特征。在众多原型案件中，“家族势力”“血缘关系”“互相包庇”已经成了黑恶势力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词。“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来源于《论语·子路》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认为，父为子隐是“仁”，子为父隐是“孝”。我国历史上多个朝代均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如秦律规定子为父隐是一种法律义务，汉宣帝时期曾规定卑幼隐匿有罪的尊长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后《唐律·名律》篇更是提出了“同居相为隐”。人情与法律的博弈是法治道路上永恒的命题，在我国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今天，亲亲相隐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在扫黑除恶题材影视、文学作品中引发伦理思考。例如《扫黑风暴》中贺芸作为绿藤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却动用一切手段帮私生子高赫逃脱杀人罪，成为其身后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狂飙》中，“亲亲相隐”的现象不再限于血亲之间，师徒情、友情、爱情均涉及其中，各色剪不断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甚至超越了血缘关系。如高启强为了给继子高晓晨洗脱持枪抢劫的嫌疑，不惜任何代价杀人灭口，是来源于对亡妻陈书婷的追爱；再如孟钰婚后对丈夫杨健违法行为的默许与“协助”，使她那曾经坚定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质的偏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对于维护丈夫与家庭所抱有的伪“责任感”的驱使……他们的行为已然违法，可却因一个“情”字而执迷不悟，愈陷愈深。其中最有深意的便是刑侦支队长李响所面临的困境，作为师傅曹闯遗言的唯一见证人，他选择对师傅的内鬼身份进行隐瞒，甚至“配合”保护伞赵立冬为黑恶势力开起了绿灯。然而李响所做的一切既是为了保全师傅生前的名誉，更是为了在暗中搜集赵立冬等人的犯罪事实，他含垢忍辱，让自己永远地活在了

煎熬与愧疚之中。《狂飙》从原型案件中提炼出“亲亲相隐”的思想以探讨情法关系，在复杂的现实与人性中展现了“亲亲相隐”思想的现代化表现，并把伦理的判断交给了观众。

在构建京海市等一系列虚拟叙事空间的过程中，以《狂飙》为代表的各大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提取了案件的内核及涉案人员的典型特征，经过艺术化的改编创作，多层次地深挖内涵，让电视剧在多个方面既植根于社会现实，又具有卓然的超越性。

二、视角独特：在节奏与想象力中野蛮生长

在叙事视角方面，近几年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通常会将正面人物的行动轨迹作为主要叙事线索，而反面主角如何从白转黑则一笔带过，突出展现案件从发现到侦破的全过程，例如检察法治剧《巡回检查组》将巡回检察组组长冯森和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然的调查行动作为叙事主线，缉毒剧《破冰行动》以警察李飞父子的缉毒行动为双线索，涉案剧《扫黑风暴》的核心事件则围绕着“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等人展开。此种叙事策略十分稳健，更侧重于表现不同执法人员与黑恶势力顽强斗争的手段及其永不言弃的精神，而在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上却较容易陷入人物脸谱化的误区。《狂飙》的叙事视角更具特色，故事背景发生在扫黑除恶工作进入常态化的新阶段之下，通过对高启强为首的黑恶势力从无到有的追溯，讲述了以安欣为主的一线警察及督导组与其长期斗智斗勇，最终将盘踞京海十余年的涉黑组织及各方保护伞彻底清除的故事。

毋庸置疑，《狂飙》中最深入人心的叙事视角便是展现高启强是如何从一个备受欺凌的小鱼贩，逐步黑化为京海市最大的黑社会头目。正是对高启强完整心路历程的剥丝抽茧、立体聚焦，

才激活了《狂飙》的生命力。从高启强跌宕起伏的命运之中，《狂飙》展现了一个原本善良的底层小人物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深不见底的黑社会漩涡，在时代的更迭中讲述了一段令人心颤的人物堕落史及“黑社会进化史”，以影视作品的力量敲响警钟。剧中，2000年的高启强守着旧厂街菜市场的一个小鱼摊，除了背负着供弟弟妹妹读书的重担外，还频频被市场管理员唐小虎和唐小龙欺辱，当他敏锐地捕捉到曾善意相助的警察安欣有可以借来一用的公安背景后，便从一个谎言开始渐渐走偏。他苦心钻研《孙子兵法》，利用种种话术与巧合，化敌为友，在旧厂街建立威望，随后又因误杀白金翰老板徐江的儿子而牵扯进更深的漩涡中，从一个单纯善良的鱼贩，逐步沦为多条命案的幕后黑手。作为反面人物，高启强能屈能伸，善于学习，有着超出凡人的魄力及智慧，这也是其手下黑恶势力能够逐渐壮大的原因，可他看似“步步高升”，实则一步错，步步错，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高启强如同一个与魔鬼交换灵魂的迷徒，一开始仅求一份安定的生活，可前期难以抵抗由唐家兄弟、徐江、陈泰等人所营造的黑暗漩涡，后期又难抵金钱与权利的腐蚀。他的堕落，掺杂着主动与被动，离不开污浊的大环境的“逼迫”，亦离不开人心与欲望的蛊惑。从2000年至今，涉黑组织的非法手段与日俱进，高启强甚至给手下的人报名商学培训课，将黑手伸向游戏厅、医美机构、银行等多个场域，经营着见不得光的放高利贷、赌场及色情行业。黑社会的非法敛财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敲诈勒索，例如唐小龙在网上开店，将卖不出去的白酒随心所欲地标上高价，配以发票卖给欠高利贷的受害者，堂而皇之地洗钱。《狂飙》让我们看到，悲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亟待拨云见日、拨乱反正，证实了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常态化的重要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狂飙》中以安欣为代表的正义队伍之所以与高启强等人殊死搏斗长达20年之久，正是因为反面人物所持的对抗力量极其顽固。美国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提出反面人物塑造原理，即“主人公及其故事的智慧魅力和情感魄力必须与对抗力量相适应”^[1]，并认为这是故事设计中最重要而又最不被理解的定义。这样的叙事安排既展现了中央清扫黑恶势力的任务之艰巨，突出了安欣等人扫黑除恶的决心及意志，也展现了高启强逐渐堕落的逻辑链条，意义不在于制作“爽剧”，而在于警钟长鸣。

在特殊的叙事视角之下，为了推动案件发展，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的叙事节奏必然张弛有度，巧用“发现”与“突转”，紧抓观众的心，做到情节的整一性。《狂飙》的故事从一份关于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问题和政法队伍中存在“保护伞”问题的举报材料开始，调查组手握材料，背负着重大的使命前往京海，为观众设下了层层悬念。通过关键人物安欣的回忆及配合调查组的努力突破，“发现”与“突转”不断交织，剧情跌宕起伏，紧扣人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经》中论述到，“发现”指的是“从不知到知的转变”^[2]，而“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2]，他认为最佳的“发现”是与“突转”同时发生的。例如《狂飙》中高启盛为了洗清哥哥高启强的嫌疑，突然主动从藏身之地回到京海，又悄悄用高启强的手机给警方发消息揭发自己，最终与高启强的“异己”李响同归于尽。在剧情发生的过程中，高启强与观众一样处于“无知”的状态，而高启盛的行为不断推动着新“发现”的出现，使剧情发生了几重“突转”：第一，高启强的内心发生了突转，他痛下决心扮演了一个与弟弟高启盛划清界限的人；第二，高启强的身份发生了突转，他从警方密切关注的嫌疑人变成了“大义灭亲”的正直企业家；

第三，高启强的前途也发生的突转，刑警李响的去世是他投靠“保护伞”赵立冬的敲门砖。《狂飙》的情节充满了整一性，事件结合严密，做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3]。

不仅如此，在富有活力的叙事节奏所搭建的框架中，《狂飙》还以丰富想象力的细节充盈着叙事的角角落落，展现出生活的粗粝感与趣味性。无论是刑警队“雏鹰队”和“麻雀队”起名时的会心一笑，还是队友间充满生趣的方言演绎出活泼的革命友谊，抑或是早期高启强在鱼缸里习惯性洗手等细节，都使人感受到生活的底色，在现实的粗粝感中又夹着些许独属于生活的幽默。

三、多线表达：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互成就

在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对故事时间线的处理中，多线表达的叙事策略更能体现人物弧光，使人物转变前后的许多言行都有着强烈的善与恶对比，构成一种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互成就。

在叙事手法方面，《狂飙》采取了三条时间线穿插叙事的方式，分别代表着不同人物的三个人生阶段，正如美国编剧悉德·菲尔德曾说的“在影像叙事过程中，角色的塑造与安排为重中之重”^[4]，《狂飙》的叙事策略虽不是独创，却能将其优势创造性地发挥到最大。随着剧情的

[1] [美]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第343页。

[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第89页。

[3]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第89-90页。

[4] [美] 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鲍玉珩、钟大丰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第21页。

倒叙与插叙，我们看见不同人物在社会的染缸下截然不同的多面。安欣从一个单纯勇敢的愣头青小伙变成了满头花发的忧虑中年人，可始终不忘初心，最终展露出有勇有谋、成熟稳重的优秀刑警的形象。在安欣的强烈对比之下，杨健则从一个刚正不阿的交警，成长为奋不顾身的缉毒警察，可最终却又被黑恶势力所腐蚀，甚至想用毒品陷害安欣。而安欣的心仪对象孟钰，更是从一个心怀梦想，敢闯敢拼的独立女性，逐渐成为丈夫杨健的包庇者，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由此可见，《狂飙》在鲜明的时间线对比中展现人物多面性，避免了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中反面人物扁平化的弊端，让每一个人物都能在人性的褶皱中立住。“悲剧化反面人物叙述其实是一种难度系数颇高的‘刀刃上的艺术’”^[1]，对比同题材电视剧《扫黑风暴》中较为扁平的反面杀手老宁，《狂飙》塑造的陈金默则更为立体。老宁作为《扫黑风暴》中多个关键命案的制造者，却有着极为次要的个人故事性，他给观众留下印象的便是每次杀人都会吃生蒜的神秘杀手形象。而《狂飙》中陈金默作为高启强的御用杀手，身世则更为曲折，他曾在监狱中一心想改造成好人，却在出狱后被高启强接济、拉拢。他的感情十分复杂，甚至临死前还既对高启强忠心耿耿，又对安欣充满感激，这些所有的情感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对女儿的爱。陈金默与老宁一样有着自己的标志性动作，每次办案后会吃上一颗棒棒糖，可这里的棒棒糖却不再如《扫黑风暴》中的大蒜那般意义不明，而是象征着陈金默的精神支柱是女儿黄瑶。再如《扫黑风暴》中孙兴与高明远的反面人物形象虽深入人心，却缺少更多人性侧面的展露，在无形中拉远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而《狂飙》中高家兄弟的形象塑造及转变则有更多可供支撑的现实逻辑，让人瞥见在他们疯狂与罪恶的背面，仍有一份来不及悔过的真心留给了家人。

不仅如此，《狂飙》的反讽叙事还体现在电视剧丰富的镜头语言，及意象空间的隐喻表达。如安欣用警戒线逼退高启强时的一组镜头设计，警戒线为前景，高启强及小弟们为后景，他们在警戒线的“警察”二字面前不断后退，象征着黑恶势力终将被正义击退，极具视觉冲击力。《狂飙》对视听语言的巧妙运用大大扩展了叙事所表达的内涵，如唐小虎被捕时逃到了一座挂着“祝您一路顺风”标语的屋顶上，但“路”字却是破损的，配上安欣适时的台词“这条路不是你自己选的吗”，便是以艺术性的立体手法表达出唐小虎的宿命。再如剧中多个官员扮演着“双面人”的形象，以他们屋内的字画为代表的意象构成了充满讽刺性的意义空间，被高启强收买的退休高干黄老的房间挂放着“人民公仆”书法作品，心狠手辣的赵立冬的办公室高悬着“上善若水”，而最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何黎明的办公室则以“清正廉洁”为标语，与他们的实际为人形成强烈的反差，多处具有超然的批判性。

对于国产扫黑除恶题材影视剧的价值观弘扬及创作规律而言，正义战胜邪恶是必然的结局，影视剧如何设计和展现正反两派人物的斗争过程便成了观众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叙事中的创新表达至关重要。以《狂飙》为代表的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叙事视角独特，在题材与现实改编上具备极强的优势及创新，故事节奏扣人心弦，巧用多线表达使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互成就，在“冷峻”与“温暖”中架起了一座现实主义的桥梁，于众多其他题材影视剧中以叙事策略方面的创新表达脱颖而出，不辱时代使命。

[王雪纯 南京大学文学院]

[1] 张均：《论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及其当代承传》，《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